

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

陶水木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310036)

内容提要: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形成的标志:一是浙系金融资本迅速发展,在上海居于主导地位,且经营趋于集团化;二是浙籍金融资产阶级基本掌握了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钱业公会和银行公会,有了财团的组织形式;三是随着金融实力的增强,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步入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四是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浙籍金融家,有了财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

关键词:浙江金融财团 标志及地位

自 1928 年 6 月日本报纸首先提出“江浙财阀”概念后,中外学术界对近代以上海为核心基地、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称谓已有“江浙财阀”、“江浙财团”、“上海财阀”、“浙江财阀”、“江浙金融财团”等多种。这些概念的资本内涵虽略有差异,如江浙财团(财阀)、上海财阀、浙江财阀既包括金融资本,也包括工商业资本;江浙金融财团仅指金融资本。但这些概念的资本籍属涵盖是一致的,即不仅包括江浙籍资本,也包括一切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其他籍资本。本文所要讨论的仅是金融资本,文中所说的浙江金融财团,是指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地区(本文的考察以上海为限),以血缘地缘关系和同业组织为纽带结成松散联系的浙江金融势力。之所以对研究范围作这样界定,意在更准确地考察浙籍金融资本在上海金融业中的地位 and 作用。

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华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崛起而形成的。由于北京政府初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主义发展的措施,也由于辛亥以后振兴实业思潮的推动,还由于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因忙于战争,暂时缓和了中国民族资本所承受的压力,民族产业资本在辛亥以后获得持续发展。金融资本适应产业资本和政府财政的需要也快速发展。1912—1927 年,全国新设银行 313 家,资本总额约 206 628 千元,是 1897—1911 年设立数的 10.4 倍,资本额的 8.1 倍,其中设于上海的 56 家,资本 33 979 千元(缺 6 家银行资本)^①。钱庄业也由辛亥前后的低潮中迅速恢复和发展,1912 年上海汇划钱庄(以下统计均为汇划庄)只有 28 家,1918 年增至 62 家,1926 年达 87 家^②。在民族金融资本大发展中,浙江金融财团逐渐形成,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1 年版,附录。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91 页。

一、浙籍金融资本迅速发展, 在上海居于主导地位, 且经营趋于集团化

上海钱业起源于浙绍商人的碳栈兼营货币存放业。在晚清, 浙帮钱庄在上海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进入民国后, 上海钱业资本日益集中到浙江帮之手, 从表 1 可以看出: 辛亥以后至 30 年代, 浙江帮钱庄家数在上海钱业中始终占 60%—73%之间; 其正附资本额始终占上海整个钱庄资本额的 70%左右, 说明上海钱业资本已基本为浙江帮所掌握^②。浙籍钱业资本中又以绍兴帮为主, 笔者查得, 在 1912 年上海 28 家钱庄中绍兴帮至少有 12 家, 占 43%; 在 1928 年 80 家钱庄中, 绍兴帮至少有 33 家, 占 41%^③。另据学者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研究统计, 在 1931 年 2 月上海 76 家钱庄中, 绍兴帮共 38 家, 占 50%^④; 在 1935 年上海 55 家钱庄中, 绍兴帮计 27 家, 仍占 49.1%^⑤。

表 1 1912—1930 年浙帮钱庄在上海钱业中的地位 资本额单位: 万两

年份	户数	帮别、户数、占%			资本额	帮别、资本额及所占%			平均资本
1912	28	浙帮	20	71.4	110.8	浙帮	87.8	79.2	4.39
		外帮	8	28.6		外帮	23.2	20.8	2.9
1924	83	浙帮	53	63.8	1004.3	浙帮	660.7	66	12.47
		外帮	30	36.1		外帮	343.6	34	11.46
1926	86	浙帮	53	61.6	1357	浙帮	855.3	63	16.13
		外帮	33	38.4		外帮	501.7	37	15.2
1928	80	浙帮	52	65	1256.3	浙帮	856.8	68	16.16
		外帮	28	35		外帮	399.5	32	14.27
1930	77	浙帮	56	72.7	1364	浙帮	1035	76.1	18.48
		外帮	21	27.3		外帮	329	23.9	15.67

资料来源: 1912 年庄名、资本、经理姓名据《上海钱庄史料》第 193—194 页; 1924 年相关资料据《总商会月报》第 3 卷, 第 7 号《南北市钱业》表; 1928、1930 年据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所录《上海钱业公会入会同业表》, 1932 年 12 月第 3 版; 其余年份据《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 202 页表改制。所列各年钱庄经理籍贯据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钱商业同业会档” S174—1—10、12、13, 及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藏:《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 年)、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等资料汇总。

① 秦润卿说, 上海钱庄“自筭路蓝缕, 开辟草莱, 迄于播种耕耘收获, 无时无地莫不由宁绍两帮中人之努力为多。”(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 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第 70 页。)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也说:“清代钱庄, 绍兴一派最有势力, 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 此派之力也。”(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第 221 页。)

② 近代上海钱业界习惯上以经理的籍贯分成若干帮, 本文沿用此说。参见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上海光明书局 1936 年版, 第 104 页; 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 见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第 72 页; 魏友棻:《十年来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 《钱业月报》第 13 卷, 第 1 号, 1933 年 1 月 15 日。

③ 据《上海钱庄史料》第 193—194 页及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所录《上海钱业公会入会同业表》1928 年所录经理人员查得, 但绍帮实际经理的钱庄肯定不止此数, 因为仍有几家钱庄经理笔者无法确定其籍属。

④ 丁裕良:《最新上海金融论》, 上海世界书局 1931 年版, 第 87—88 页。

⑤ 该年 55 家钱庄经理籍属情况是: 绍兴帮 27 家, 占 49.1%; 宁波帮 16 家, 占 29.09%; 苏州洞庭山帮 7 家, 占 12.73%; 上海本地帮共 3 家, 占 5.45%; 镇江帮 2 家, 占 3.64%, 见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 光明书局 1936 年版, 第 104 页, 百分比系笔者算出。

浙系银行资本发展也很快。据杜恂诚统计,在1912—1927年间上海创办的56家银行中,知创办人或企业代表的49家,笔者查得浙商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29家,占59%^①。但该项统计尚有疏漏,据笔者统计,1912—1927年间浙籍商人在上海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银行至少有37家^②。这说明,上海银行资本很大程度上已为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所掌握。法国学者白吉尔说上海“银行业为浙江企业家所垄断”^③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30年代日本学者森次勋说“浙江系曾将上海之士著新式银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并非是夸大之词^④。

浙系保险资本在上海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他们是上海商办保险业的开拓者。1904年宁波帮参与周金镛创设华洋人寿保险公司。1905年湖州巨商庞元济等创办了合众水火保险公司,同年朱葆三(定海)、傅筱庵(镇海)、严信厚(慈溪)、周金镛、王一亭(吴兴)创设华兴水火保险公司。随后又有朱葆三、沈仲礼(鄞县)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徐冠南(嘉兴人)创办信益保险公司,朱葆三创办华成经保险公司,王一亭、李云书(镇海)参与创办华通水火保险公司,李厚祚(镇海)参与创办延年人寿保险公司^⑤。进入民国后,浙系保险资本在上海仍占明显优势。1934年,总公司设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共有22家^⑥,笔者已查得浙系经理的至少有13家^⑦,占总数的59%。这还不包括宋汉章手创并任董事长、浙人董事占多数的中国保险公司,及原由朱葆三等甬商创办、这时浙人董事仍占多数的华成经保险公司等。

浙系证券、信托业资本在上海的优势也很明显。1920年7月1日,虞洽卿(镇海)等发起创设了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任理事长,6名常务理事中浙籍有郭外峰(鄞县),盛丕华(镇海),周佩箴(吴兴),赵家艺(慈溪)4人;在13名理监事中浙籍至少有10人;由发起人认领的9900股股本中,仅宁波帮、湖州帮就有6400股,占总数的65%^⑧。随即开业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也由孙铁卿(余姚)、冯仲卿(余姚)、张慰如(嘉兴)等发起创设^⑨,他们都任常务理事,以后孙、张还先后任理事长^⑩。随后交易所勃兴,与交易所股票业务关联的信托公司也随之兴起。1921年6月绍兴帮巨子田祈原(上虞)、田时霖(上虞)、宋汉章(余姚)、王晓籁(嵊县)、胡熙生(余姚)、谢伯爰(绍兴)、裴云卿(上虞)、孙铁卿(余姚)、陈一斋(上虞)、胡莼芎(余姚)、周星堂(绍兴)、李济生(上虞)、严成德(余姚)等46人发起成立中央信托公司,额定资本达12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为当时信托公司之最。永嘉

① 创办的银行、资本、创办人或企业代表见前揭杜恂诚书附录,籍贯系笔者据其他资料查得。

② 笔者博士论文:《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附录一,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③ [法]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④ [日]森次勋著,汤怡译:《上海财阀之鸟瞰》,《经济评论》第2卷,第1号,1935年。

⑤ 前揭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附录一。

⑥ 不包括永安人寿、永安水火、先施人寿、先施置业、太平、上海联保水火6家分公司,见《保险年鉴》,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版。

⑦ 这13家保险公司是:华兴(董事长傅筱庵,镇海;总经理厉树雄,定海)、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董事长田祈原,上虞;总经理严成德,余姚)、中国天一(董事长王伯元,慈溪;总经理梁晨岚,宁波)、四明(董事长孙衡甫,慈溪;总经理谢瑞森,宁波)、安平(董事长卢学溥,桐乡;总经理董汉槎,余姚)、泰山(董事长徐新六,余杭;总经理孙仲立,不明,但从该公司董事徐新六、李馥荪、刘鸿生、王启宇、胡孟嘉、厉树雄、竹森生、徐奇康都是浙人看,董事兼总经理孙仲立浙籍可能居大)、通易信托公司保险部(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溯初,永嘉)、华安水火(董事长沈联芳,吴兴;总经理傅其霖,镇海)、宁绍人寿(董事长乐振保,鄞县;总经理胡咏骐,宁波)、宁绍轮船公司保险部(董事长乐振保,鄞县;总经理袁履登,鄞县)、肇泰(经理徐可陞,宁波)、丰盛(董事长周作民,江苏淮安,经理李祖超,宁波)、宝丰(总经理朱如堂,吴兴),见前揭《保险年鉴》,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⑧ 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5页,第26页。

⑨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341页;《申报》1920年5月21日。

⑩ 《旧上海的金融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0页。

黄溯初、徐寄庠等于1921年7月设立的通易信托公司(黄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也颇有实力。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的联手投机,终于引发“民十信交风潮”。风潮过后,交易所能继续营业的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6家^①,信托公司“能不卷入旋涡而得以独存者仅中央、通易两公司耳”^②,所以有人称这两家公司“诚信托公司之岁寒松柏也”^③,而且直至20年代末上海仍仅这两家信托公司^④。中央信托公司风潮过后“信用卓著,营业发达”,1927年资产已达811.4万元,1931年增至1106万元,在全国信托业“足称为翘楚”^⑤。这说明,上海证券信托业资本也有向浙江帮集中趋势。浙籍金融资本不但在各类金融机构占据明显优势,而且经营趋于集团化。

首先,浙系钱庄、银行、保险业内部的相互代理、相互开户、联合清算、相互投资和兼职等加强了彼此联系,使各类浙籍金融资本具有集团色彩。上海钱庄间早就存在拆借、收解等业务联系。随着钱业的发展各庄间联系日益密切,其中公单制和准备库制对加强各庄联系关系尤重。1890年宁绍帮各大钱庄首创“公单制度”,每天下午2时后,各汇划庄将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原出票钱庄换取公单,然后交钱业“汇划总会”汇总,由该总会将各庄公单相互扎抵,是为中国票据清算之滥觞。这一制度大大加强了钱庄间的联系。因为(1)为了实现在“汇划总汇”清算划拨,各汇划庄必须相互存入款项,这就密切了各庄间联系;(2)汇划规章规定:元、亨、利、贞四等未入园庄不得赴汇划总会汇划,必须转托与其有往来的汇划庄代理,需代理庄必须存款于代理庄,用以清算划拨,这又加强了汇划庄与非汇划庄之间联系。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钱业界又创设钱业准备库,规定凡公会会员(即汇划钱庄)一致加入为基本会员,元字庄愿加入者也为会员,非至闭歇不得退出。准备库额定财产准备2700万元,现金准备300万元,各基本会员必须缴存30万元以上的准备财产及现金。准备库的任务是办理同业存放、贴现、兑换和票据交换、转帐及其与银行收解等事宜,为此各会员庄必须在准备库各开往来户。准备库制度使上海钱业成为风险共担、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同业集团,而浙江帮既是该集团的主体,又完全掌握了准备库的实权,准备库第一届主席及5名常务委员会是清一色的浙江系,15名执行委员中浙籍也占14人^⑥。此外,浙帮钱庄经理间的相互投资使各庄联系更为紧密。20世纪20年代前后,浙帮钱庄经理间的相互投资十分普遍,如永丰庄经理陈一斋(上虞)是宝丰、志丰、滋丰、鸿丰、厚丰、春元、怡大多家钱庄投资人;滋丰庄督理李济生(上虞)在永丰、志丰、和丰庄拥有股份;五丰庄投资人张文波(上虞)是存德庄经理;春元庄投资人胡莼蓼(余姚)是怡大庄经理,并在信孚庄拥有股份;志诚庄经理徐承勋(慈溪)投资永聚、益昌钱庄;而志诚庄投资人谢韬甫(余姚)是承裕庄经理;康裕庄经理盛筱珊(慈溪)也是志诚庄投资人;福源庄经理秦润卿(慈溪)、鸿胜庄经理郑秉权(慈溪)同时又是鸿祥庄投资人;信成庄经理陈梅伯(上虞)同时是永兴

① 冯子民:《民元来上海之交易所》;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7年编印,第151页。

② [黄]溯初:《信托业之过去与将来》,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1934年),台湾文海影印本,第203页。

③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华丰印刷所1926年11月,第127页。

④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第18页。

⑤ 前引《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222页。

⑥ 准备库主席秦润卿(慈溪),常务委员秦润卿、俞佐庭(镇海)、傅松年(鄞县)、裴云卿(上虞)、胡熙生(余姚),委员秦润卿、俞佐庭、傅松年、裴云卿、胡熙生、李寿山(慈溪)、王鞠如(绍兴)、盛筱珊(慈溪)、何衷筱(上虞)、赵文煊(上虞)、谢韬甫(余姚)、王怀廉(余姚)、李济生(上虞)、徐伯熊(慈溪)、王伯垠(江苏太仓)。名单据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第233页,1932年12月第三版。籍贯系笔者据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档”,及《上海市钱业调查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调查课1934年油印本,藏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等查得。

庄投资人等等^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3年时仍有9位浙帮钱庄经理同时投资2家以上钱庄^②。

20年代前后,沪上浙系银行以南五行和宁波系三行为核心联合起来,经营趋于集团化。“南五行”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28年总行迁沪)、交通银行上海分行(1928年总行迁沪)、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③。中国银行的基础是大清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由浙帮宋汉章、胡棣荃(余姚)经营的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商化”日益明显^④,浙籍股东比例日重,如叶景葵(杭州,大清银行总行署理监督)、项兰生(杭州,大清银行总行书记长)、吴鼎昌(吴兴,大清银行总务科负责人)、宋汉章、蒋抑卮(杭州)、胡藻青(杭州)、沈新三(嘉兴)、蒋孟萍(吴兴)、周湘龄(吴兴)、张澹如(吴兴)等都是大股东^⑤。武昌起义爆发后,叶景葵、吴鼎昌、宋汉章为保全商股利益,在上海发起成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并呈请南京临时政府“将大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仍由宋汉章任经理。此后,宋氏长期担任该职,副经理一职也长期由他的余姚同乡担任^⑥。所以该行被视为“浙江系”银行^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原并非浙系经营,1917年初吴兴人钱新之出任沪行副经理,次年升任经理。1921年钱氏引进胡孟嘉(鄞县)开创国际汇兑业,并努力扩大在金融和工商界的影响,使沪分行成为交行业务的“龙头”。1922年钱新之北上任交行总行协理后,原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盛竹书(镇海)继任沪行经理,1927年盛氏病故后,胡孟嘉升任经理。1928年交行总行迁沪,胡即升任总行经理,桐乡人卢学溥任总行董事长,所遗沪行经理一度由唐寿民(镇江)担任,但不久即由胡孟嘉兼任,后又由钱业领袖秦润卿继任^⑧。所以该行与中国银行一样被视为“浙江系”银行^⑨。浙江兴业银行自1907年创办时其大股东就是清一色浙籍^⑩,这种状况直至30年代没有改变^⑪。1914年该行在叶景葵、蒋抑卮主持下力行改革并迁总行于沪上,之后该行在叶、蒋及盛竹书的合力经营下业务迅速发展,其存款额曾“连续多年在商办银行中居第一位”^⑫,成为全国商办银行中的佼佼者。浙江实

① 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附录三,《上海钱庄史料》第264—269、764—765页有关内容。

② 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调查课:《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汇总,藏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

③ 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光明书局1936年4月版,第98页。

④ 大清银行开办资本为400万两,官商各半,1908年资本增为1000万两,新增600万两仍为官商各半,商股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上海。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后,商股改为存款,中行名为官商合办实无商股。1915年始招商股,且商股比例迅速提高,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为97.47%,官股只剩5万元。商股绝大部分是1912年改为存款的原大清银行股东。

⑤ 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籍贯系笔者据其他资料查得。

⑥ 1913年至1917年江苏宝山的张嘉璈曾任副经理,从1918年起一直由余姚人胡棣荃、严成德、冯仲卿、史久鳌任副经理。其中冯仲卿担任副经理达26年(1921—1947)。

⑦ 雷啸岑译:《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时事月报》第7卷,第1.2期。见陈真主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329页。

⑧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1932年版,第54—55页,籍贯系笔者查得。

⑨ 雷啸岑译:《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时事月报》第7卷,第1.2期。见陈真主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329页。

⑩ 拙作:《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表2—4。

⑪ 如1934年浙兴13名董监事中,除2名难以查清籍属外,余皆浙籍。董监事名单见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66页,台湾文海影印本。

⑫ 尚其亮等:《浙江兴业银行兴衰史》,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朱镇华在《徐寄庠生平事迹》中说:“从1919年到1926年,(浙兴)连续几年存款额占全国大银行的第一位”,见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旧上海的金融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业银行的基础是原浙江省银行上海分行。辛亥后,浙江军政府派李馥荪(绍兴)、陈朵如(萧山)接管浙江银行,经清理后改组为官商合办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欧战期间,该行业务蒸蒸日上,且“商化”日浓。大战结束后,仅上海分行李馥荪、周宗良(宁波)、卢学溥(桐乡)3人的股份就超过30万元^①。1923年李馥荪在商股力量的支持下策动官、商拆伙,商股在上海设立浙江实业银行,实收资本180万元,李馥荪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后兼董事长),陈朵如为副总经理,大股东几乎是清一色浙江人^②,成为“浙江系之重要金融机关”^③和沪上商办银行的后起之秀。成立于1915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然主要由苏籍的庄得之、陈光甫创办,并由庄、陈分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但“浙实”总经理李馥荪也是发起人,并在创办时即投资2万元,占该行7万元创业实收资本的28%^④,以后他长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而且该行与“浙兴”、“浙实”业务联系密切,“所以陈光甫虽属苏人,而实与浙人各行伙为伙伴”^⑤。

宁波系三行即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垦业银行^⑥。四明银行自1908年成立时就是纯粹的宁波帮银行,其发起人和第一届董事会是清一色宁波人^⑦。进入民国后,该行在总经理孙衡甫(慈溪,后又兼董事长)的主持下(前后达20余年),“储蓄极为发达”^⑧,“信誉也日旺”^⑨,至二三十年代之交,该行资本和存款额在上海商办银行中均名列前茅^⑩。进入民国后中国通商银行也逐渐演化为宁波帮银行。辛亥以后,通商银行的最大股东招商局的股份全数派给股东,而浙商严子均(慈溪)、严廷楨(慈溪)、周金鑑、傅筱庵、王存善(杭州)、谢纶辉(余姚,时任通商银行华经理)都是20世纪初招商局大股东^⑪,这就使通商银行中浙系的股权大为增加。1919年谢纶辉(余姚)去世后,傅筱庵任通商华经理(后改为总经理),次年通商董事会议决:以后关于存款、放款、抵押及进出利息都由傅氏决定^⑫,傅氏遂长期控制这家银行。1934年时,该行董事会已是清一色的浙系、特别是宁波帮^⑬。中国垦业银行原设于天津,1929年王伯元(慈溪)、秦润卿(慈溪)、梁晨岚(宁波)、李馥荪、徐寄庠(永嘉)等接办后设总行于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伯元为常务董事兼经理,“实力颇厚”^⑭。在全部250万元资本中,王伯元、王仲允兄弟占58%,其董事会也是清一色的浙籍人^⑮。

① 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② 1932年时李馥荪、钱新之、周宗良的股份占50%以上,以后李馥荪个人股份曾占60%左右。见秦天孙:《李馥荪与浙江实业银行》,浙江省政协文史委:《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③ [日]森次勋:《上海财阀之鸟瞰》,《经济评论》第2卷,第1号,1935年。

④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⑤ 前引《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209页。

⑥ 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第98页。

⑦ 前揭拙作表2—5。

⑧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1926年版,第18页。

⑨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第19号。

⑩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1935年版,第4页。

⑪ 他们都是招商局董事或查帐员,见《轮船招商局历年大事记》(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⑫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⑬ 即董事长傅筱庵,常务董事徐圣禅(镇海)、谢光甫(谢纶辉之子)、孙衡甫(慈溪)、朱子奎(定海,朱葆三子),理事厉树雄(定海)、俞佐廷(镇海),总经理朱子奎。见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43页。

⑭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1932年版,第270页。

⑮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49—50页。即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润卿、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王伯元、常务董事何谷声(余姚)、王仲允(慈溪)、梁晨岚(宁波),董事李馥荪(绍兴)、徐寄庠(永嘉)、周宗良(宁波)。

上述银行、特别是“南五行”在经营上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包括相互对开往来户、相互代理收解、在头寸紧缺时相互存款以通融支援,“浙实”、“浙兴”、“上海商业储蓄”向中国银行领用兑换券等等,虽无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实已有联合经营之效果。

在论及浙江金融财团时,不能不对“北四行”金融集团略加讨论。“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它们中除中南外,都于欧战时期设立于天津。1921年11月,盐业、金城、中南三行“为活泼金融,压低利率”,“以期实业勃兴而国民生计可藉以发展”,共同出资200万元实行联营,在上海、天津、北京设立联合营业事务所,不久成为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随即在上海设立四行准备库,以十足准备联合发行银行兑换券。1923年1月,四行又各出资25万元,联合在上海设立业务完全独立的四行储蓄会^①,后又于1931年成立四行企业部和四行调查部,形成有组织的颇具规模的银行集团。学术界把这一集团称为“华北财团”。这是不确切的,这不仅因为其中的中南银行总行设于上海,它的资本来源、业务重点等都在“南方”^②;也不仅因为四行中金城银行的主要创办人吴鼎昌是浙籍吴兴人,从1917年起吴在任金城董事的同时,又任盐业银行总经理达20余年。更重要的是,四行集团的形成是以四行联营为标志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是四行的统一领导、协调和调剂中心,而吴鼎昌集这3个机构的主任于一身,是这一金融集团的首脑。联营以后,四行业务重心也向上海转移^③。1926年初,与浙帮各银行关系密切的钱新之(吴兴)又担任四行准备库及储蓄会副主任,坐阵上海,主持四行在上海的统一行动,“与浙江系财界结着密切关系”^④。1930年“四行储蓄会”规定:四行借用储蓄会资金须以栈单向储蓄会实行再抵押,储蓄会成了四行的“中央银行”^⑤。很明显,通过几个联营机构,吴鼎昌、钱新之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四行经营大权。

浙系银行的集团化是建立在内部的相互投资和兼职基础上的,通过相互投资和兼职,使浙系投资和主要由浙系投资经营的银行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集团群体。如钱新之是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又是浙江实业银行驻行董事、上海市银行理事,大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农工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辛泰银行董事和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副主任。中国银行董监事和经理人员有李馥荪、徐寄庠、宋汉章、卢学溥、冯仲卿(余姚,副经理)、史久鳌(余姚,副经理)、潘寿恒(余姚,副经理)、程慕灏(桐乡,副经理),其中董事长李馥荪又兼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徐寄庠又是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中国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和上海绸业银行监察人;宋汉章又兼任新华储蓄银行及中和商业储蓄银行、永亨银行董事;卢学溥又任浙江实业银行驻行董事、永亨银行董事;冯仲卿又兼任中和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上海绸业银行、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史久鳌又是惠中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至中银行董事、信通商业储蓄银行监察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中有朱子奎(定海)、傅筱庵、王一厅、朱子谦(吴兴)等,而王一厅又任江南银

① 《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7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89页有关内容。

② 中南银行由爪哇侨商黄奕住创办,在500万元开业资本中,黄出资350万元。

③ 1934年上海四行储蓄会库存现金2948万元,仅次于中央银行、华侨银行居全国28家重要银行第三位;盈利215万元,占四行盈利总和的72%,见中行总管理处:《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1935年四行准备库发钞达7228万,占全国重要银行发钞额的12.3%。

④ 前引《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时事月报》第7卷,第1.2期,1932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23页。

⑤ 见应永玉:《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

行董事、广东银行上海分行参事；朱子奎又是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傅筱庵则是通商银行董事。通商银行常务董事还有徐桴（镇海）、孙衡甫、谢光甫，而徐同时任上海市银行理事兼总经理，大来商业储蓄银行、辛泰银行董事；孙氏又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谢光甫兼任信通商业银行董事。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中有宋汉章、俞佐庭、冯仲卿、史久鳌、金润泉（萧山）、马寅初（嵊县）、王绶珊（绍兴，著名盐商），而俞同时任四明银行、大来银行、江海银行、惠中商业储蓄银行、统原商业储蓄银行、国泰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在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董事会中，除刘任董事长外，还有刘吉生（定海）、胡孟嘉（鄞县）、徐新六（余杭）、吴启鼎（慈溪）、戴耕莘（镇海）等，而刘鸿生、刘吉生兄弟又任中国煤业银行董事，刘吉生还任江浙商业储蓄银行董事；胡孟嘉又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市银行理事、新华储蓄银行董事、国华银行监察人；徐新六又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中除上述徐寄庠、徐新六外，还有叶葵初、蒋抑卮、张澹如（吴兴）、沈籁清（常务董事，嘉兴）等，而张澹如又是通易银行、华安银行、华业银行、上海绸业银行董事及嘉华银行上海分行参事，蒋抑卮又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监察人。中国垦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王伯元，同时又是国泰银行董事长、上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宁波实业银行董事。上海绸业银行发起人、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延松（绍兴）同时又是大沪商业银行董事。金城银行创办人吴鼎昌除任该行董事外，又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四行联营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主任。笔者不完全统计，1934 年有 11 位浙籍银行家在上海 5 家以上银行中担任董监事，有 23 位浙籍银行家同时在上海 3 家以上银行董监事会中任职^①。

浙籍保险业资本也显集团化趋势。其一，若干家浙系保险公司由于经营得法，资本快速积累，成为业中翘楚。如完全由绍兴帮钱庄创设的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开办以后“业务年有进展，故信誉颇佳”^②，至 1937 年资本达 500 万元，居华商保险公司魁首^③。由王伯元任董事长、梁晨岚任总经理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1934 年创办时额定资本 500 万元，实收资本 250 万元，居沪上保险业第二位^④。1931 年由宋汉章等创设并由宋任董事长的中国保险公司，额定资本 500 万元，实收 250 万元^⑤，与天一保险公司组成沪上保险业第二阵营。其二，出现了以浙系为主的联合保险组织。1933 年，浙系通易信托公司保险部、宁绍水火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联合永宁、永安、先施 7 家公司成立华商联合保险公司，黄溯初（永嘉）为董事长，不久兼任总经理，本着互助合作原则，“期达共存共荣目的”，这是我国“专营再保险业务的第一个公司”^⑥，设立后“营业极为发达”^⑦。

其次，浙籍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资本间相互渗透，融成一体。这种融合的一种形式是浙帮银行附设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或信托公司附设保险公司。华商银行创设保险公司由浙商首开其端，1906 年中国通商银行就创办华兴保险公司，该行总董朱葆三及股东严信厚、周金镛、

① 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1932—1934），台湾文海影印版，第 15—122 页。

② 《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社出版 1936 年，第 7 页。

③ 罗北辰：《民元来我国之保险业》，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 1947 年编印，第 95 页。

④ 《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社 1936 年版，第 52 页。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何谷声（余姚）、秦润卿（慈溪）、王子崧（杭州）、钱新之（吴兴）、梁晨岚也是清一色浙江人。

⑤ 《保险年鉴》，下编，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 1935 年 3 月版，第 33 页。

⑥ 罗北辰：《民元来我国之保险业》，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 1947 年编印，第 94 页。

⑦ 《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社出版，1936 年，第 12 页。

傅筱庵是公司创办人和企业代表。民国后,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长期任保险公司董事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系银行投资保险公司大为增加。1931年,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章设立中国保险公司,并任董事长。1932年,浙江兴业银行创设泰山保险公司。1933年四明银行设立四明保险公司。1934年中国垦业银行创办天一保险公司。浙系两家信托公司也都参与投资保险业,1921年绍帮中央信托公司创设保险部;通易信托公司也于1927年设立了保险部。

除这类显而易见的融合外,更重要的融合是浙系银行、保险、信托业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兼职,这样就把前述银行业连锁董监事会扩大到整个近代金融业。我们仍以前文例举银行业内部相互投资的1934年为例。该年中国保险公司董事会中有前述浙籍银行家宋汉章、李馥荪、冯仲卿、史久鳌、潘久芬、金润泉等,而宋又任中央信托公司及该公司保险部董事,李馥荪又任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银行家钱新之同时兼任太平水火险公司常务董事,安平、丰盛水火险公司董事。徐新六又兼任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安平水火险公司董事。胡孟嘉兼任泰山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公司董事。徐寄庠兼任上海信托公司常务董事,东南、通易两信托公司董事及通易信托公司保险部董事。蒋抑卮兼任通易信托公司监察兼保险部董事。傅筱庵兼任华兴保险公司董事长。张澹如兼任通汇信托公司常务董事,上海、东南两信托公司董事。孙衢甫又任四明保险公司董事长。王伯元又任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厉树雄是上海保险公会主席,又任华兴保险公司总经理,泰山、华成经两保险公司董事。胡咏骐任上海保险公会常务委员,又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总经理。傅其霖任华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又兼任华兴、华成经保险公司董事,中国海上意外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同时任上海保险公会执行委员^①。

再次,浙籍钱业资本与银行等新式金融资本间因相互投资和兼职,融为一体。这种相互投资和融合有多种形式。一是素营钱业的钱庄庄东,在经营钱庄的同时投资银行等新式金融业。被称为上海9大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的镇海李家、宁波秦家是其中的代表。李家后代李咏裳于1919年、1923年、1931年先后与甬帮巨商徐庆云、徐承勋等开设渭源、敦余、恒异钱庄^②,继续经营钱业。同时向银行业拓展,1908年参与发起创办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以后一直任董事)。1921年又参与创办中华劝工银行,并任董事长。1928年,他还发起创办恒利银行,兼任董事长^③。秦家至第三代秦善富、秦善德、秦善福时,除继续经营上海恒兴、恒隆、恒宝、恒异、慎源、同庆及宁波晋恒、鼎恒、福恒、泰源、衍源等多家钱庄外,也开始向银行投资。1932年,秦氏三兄弟参与创办上海统原银行,3人均任董事,秦善德还兼任副经理^④。二是大批工商业者同时投资银行与钱庄。“金子大王”王伯元以标金业起家后,独资或与人合伙开设鸿胜、同庆、同润等9家钱庄,同时任垦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国泰银行、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大华银公司、宁波实业银行董事和乾一银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是近代金融界颇具影响的人物。孙直斋(绍兴)主要从事锡箔、造纸和旅店业,同时开设了慧丰、荣康、惠昌3家钱庄,又是惠丰储蓄银行大股东兼对外总代表、华东银行董事长^⑤。以棉布商业起家,后经营棉纱工

① 《保险年鉴》,下编,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3版,第9页至150页,第160页;及上海市商会商务科:《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1页至234页有关资料汇总,台湾文海影印本。

② 《上海钱庄史料》,第735页;《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47号,第56号。

③ 《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61、91页。

④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9号;《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119页。

⑤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17号,第13号。

业、染织工业的余葆三，开设有信康、慎源钱庄，1932年参与创办统原银行，并任董事长^①。此类事例，俯拾皆是。三是一批出身钱业的钱庄合伙人出任银行经、副理或董、监事。孙衡甫“由钱业出身”，后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多家银行、保险公司董事，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银行家，但他仍长期合伙开设信裕、恒隆、恒来、益昌慎记、成丰等钱庄^②。冯仲卿也由上海“南市元泰钱庄习业出身”，后又到同乡陈春澜开设的兆丰钱庄服务，1909年入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后升任该行改名的中国银行沪分行副经理达26年，但他仍是上海志诚、和丰、福泰和汉口衍源等钱庄合伙人^③。谢光甫（余姚）出生于钱业世家，本人也出身于钱业，后继承父（谢纶辉）业，长期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常务董事（一度任总经理）、华兴保险公司及华安保险公司董事，但他又一直是同余、聚康等钱庄合伙人^④。何谷声（余姚）也系钱业出身，后改营标金、银行等业，30年代初任中国垦业银行常务董事，惠中银行、乾一银公司、大华银公司、天一保险公司董事，及泰康、润鸿金号大股东，同时是慎源钱庄合伙人^⑤。

四是钱业经理人员投资近代金融业，并在其中担任经、副经或董、监事，成为浙系银行连锁董监事会成员，这是更为重要的融合形式。如兆丰庄经理胡桂芬兼任中国银行副经理；敦余泰记庄经理楼恂如任中华劝工银行经理^⑥。志大庄副经理王子崧（杭州）任交通银行沪行副经理、总行发行部经理、天一保险公司董事^⑦。福康庄督理、首任钱业公会会长朱五楼于1918年参与发起创办上海永亨银行^⑧。福源庄经理秦润卿于1921年发起创办棉业银行，并任董事长^⑨。同年绍兴帮钱业经、副理16人参与发起人创办中央信托公司，并有7人进入董监事会^⑩。据笔者统计，1934年有26位浙帮钱庄经理（不包括副经理）同时在上海的银行、保险、信托等近代金融组织中任董事长、经理或董监事，其中11人同时在两家以上近代金融企业中任职，俞佐庭、秦润卿的兼职更达7家以上，他们融钱庄老板与近代银行家于一身。

以上各种形式都直接融通了银、钱两业资本，沟通了两方面营业，使浙籍钱业资本与银行等新式金融资本融合，经营趋于集团化。这也说明：认为中国的钱庄与银行没有渊源关系，钱庄业者不易直接向银行家转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浙籍金融家基本掌握了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有了财团的组织形式

近代上海金融同业组织主要有钱业公会、银行公会，这也是上海最具影响的两个同业组织，它们都是由浙籍金融家发起成立的，其实权也主要掌握在他们之手。

①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51号；《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119页。

②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19号；《上海钱庄史料》，第769页。

③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32号。

④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8号；《保险年鉴》1935年版，下编，第109页。

⑤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第63号。

⑥ 徐寄庾：《最近上海金融史》，1926年版，第48页，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⑦ 《上海钱庄史料》，第149页；《保险年鉴》1935年版，下编，第28页。籍贯据其他资料查得。

⑧ 《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金融业》，第29页。

⑨ 徐寄庾：《最近上海金融史》，1926年版，第51页。

⑩ 《上海钱庄史料》第122—123页。进入董监事会7人是：永丰庄经理田祁原（上虞），副经理李济生（上虞）；义生庄经理田子馨（上虞）；同丰庄经理裴云卿（上虞）；怡大庄经理胡熙生（余姚）；永余庄经理李菊亭（绍兴）；安裕庄经理王鞠如（绍兴，由其子王允中代表）。

表 2 浙江帮在上海钱业公会中的地位

类别 届期		会 长		副会长(常务委员)		会董、委员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人数	浙籍	%
第一届	1917	朱五楼	吴兴	秦润卿	慈溪	无		
				魏福昌	余姚			
第二届	1919	朱五楼	吴兴	王鞠如	绍兴	无		
				盛筱珊	慈溪			
第三届	1920	秦润卿	慈溪	田祈原	上虞	3	2	67
第四届	1922	秦润卿	慈溪	田祈原	上虞	10	9	90
第五届	1924	田祁原	上虞	秦润卿	慈溪	10	9	90
第六届	1926	秦润卿	慈溪	谢韬甫	余姚	10	9	90
第七届	1928	秦润卿	慈溪	无	无	14	11	79
第八届	1931	秦润卿	慈溪	裴云卿、胡熙生、俞佐廷、严均安(外)		10	9	90
第九届	1933	秦润卿	慈溪	裴云卿、王怀廉、俞佐廷、席季明(外)		10	9	90
第十届	1935	何衷筱	上虞	邵燕山、刘午桥、陆书臣(外)、席季明		10	8	80

资料来源:1922、1924、1926、1935 年名单据“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档”,上海市档案馆藏;其他年份据《上海钱庄史料》第 647—651 页历届钱业公会委员名录,籍贯系笔者据前述钱业公会档及《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 年)、《上海总商会同入录》等资料查得。

注:钱业公会自 1931 年始设主席、常委委员、执行委员;非浙籍人士概注以“外”。

上海钱业早在 1776 年就设立了公所。19 世纪 60 年代钱业重心由南市移至北市后,南市钱业为重振雄风于 1883 年另建南市钱业公所,北市钱业也于 1889 年创设钱业会馆,上海钱业自此出现了南公所与北会馆并立的局面,但实际上以新型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的北市钱业居于领导地位,不但钱庄数量和资本超过南市,银拆、洋厘行情也以北市为据^①。而北会馆完全由浙江帮发起兴建,其“创事者,余姚陈淦;董役者,上虞屠成杰,余姚王堯阶、谢纶辉,慈溪罗秉衡、袁璠,鄞县李汉绥”^②,他们掌握了该会馆的领导权。20 世纪初,北市钱业以谢纶辉经理的承裕庄余屋作为会所成立了钱业会商处,它既是钱业诸领袖集议商定业中大事之所,又是钱业对外联络机构。1917 年 2 月,北市钱业又以此为基础成立沪北钱业公会。南市钱业立即表示希望加入公会,以结束上海钱业分立南北两个组织的局面,于是上海钱业界统一组织——上海钱业公会同时宣告成立。浙江帮钱庄的强大实力在这一组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见表 2。

由表 2 可知:从 1917 年上海钱业公会创办到抗战爆发前的近 20 年中,该会会长始终为浙江帮朱五楼、秦润卿、田祁原、何衷筱垄断,其中秦润卿先后担任 6 届,任期达 13 年;朱五楼也连任 2 届,田祁原、何衷筱各任 1 届。公会副会长(副董)则先后由浙江帮秦润卿、魏福昌、王鞠如、盛筱珊、田祁原、谢韬甫担任。公会的历届董事、执行委员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浙籍人,大部分年份浙籍人都占 90%,最低的第三届为 66.7%。在 4 名常务委员中,浙帮所占比重也多在

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 31 页。
② 《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壁记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01 页。

75%，比例最低的第十届也占 50%。在近 20 年中，只有 8 位外帮钱业经理人员分担过钱业公会委员和常务委员职务（均江苏籍）。可见，浙江帮完全控制了上海钱业公会，钱业公会这一纯正的同业组织几乎成了浙江帮钱业经营商的同乡组织，成了浙江钱业集团的代名词。在近代上海，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业缘组织像钱业公会这样完全被一个地缘商人群体所掌握。

表 3 1919—1931 年上海银行公会历届委员地缘结构

类别 届期	会长(主席)		副会长		董事(委员、常委)	浙%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姓名、籍贯	
第一届 1918.7	宋汉章 (会长)	浙江 余姚	陈光甫	江苏 镇江	宋汉章、盛竹书(浙)、李馥荪(浙)、倪远甫(苏)、陈光甫、孙景西(皖)、陶蓝泉	57.1
第二届 1920.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钱新之	浙江 吴兴	盛竹书、钱新之、孙衡甫(浙)、倪远甫、孙景西(皖)、江少峰(粤)、葛绳武(川)	43
第三届 1922.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孙景西	安徽 寿县	宋汉章、钱新之、盛竹书、李馥荪、倪远甫、孙景西、叶扶霄(苏)、林康侯、田少瀛(苏)	44.4
第四届 1924.9	倪远甫 (会长)	江苏	孙景西	安徽 寿县	宋汉章、李馥荪、吴蔚如(浙)、倪远甫、孙景西、陈光甫、叶扶霄、吴蕴斋(苏)、郑鲁成	37.5
第五届 1926.9	盛竹书 (会长)	浙江 镇海	吴蕴斋	江苏 镇江	宋汉章、李馥荪、徐新六(浙)、胡孟嘉(浙)、陈光甫、倪远甫、吴蕴斋、叶扶霄、黄明道	50
第六届 1927.1	无		无		宋汉章、李馥荪、徐新六(浙)、胡孟嘉(浙)、陈光甫、倪远甫、吴蕴斋、叶扶霄、黄明道	50
第七届 1927.12	无		无		胡孟嘉、徐新六、李馥荪、贝淞荪(苏)、陈光甫、吴蕴斋、孙景西、倪远甫、叶扶霄	33.3
第八届 1931.6	李馥荪 (主席)	浙江 绍兴	林康侯 (秘书长)	江苏 上海	李馥荪、胡孟嘉、徐寄庾(浙)、贝淞荪、吴蕴斋	60

资料来源：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附录”，1925 年版，此据台湾文海影印版；徐寄庾：《最近上海金融史》，1983 年版，第 112—114 页；上海档案馆藏银行业同业公会档 S173-1-21。籍贯系笔者据历届上海总商会名录等资料查得（人名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籍贯）。

上海银行公会主要也是由浙籍银行家发起成立的。早在 1915 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张嘉璈就与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等发起由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 7 家银行经理人员参加的聚餐会，每天中午各银行要人聚餐一起，藉以讨论一切。当时没有选举会长、会董，也无章程，“全系精神上之结合”^①。然而这一松散的、不正式的组织成为以后银行公会的组织基础。1918 年宋汉章、徐寄庾、钱新之与苏籍的陈光甫等正式发起成立银行公会。公会初创时有会员银行 12 家，前述“南五行”及宁波系四明银行都成为创始会员^②，选举董事 7 人，复由董事选举经验丰富的宋汉章为首任会长，“浙实”经理李馥荪和“浙兴”总经理盛竹书均为首届董事，浙籍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掌握了银行公会实权，这种地位以后也没有根本动摇。由表 3 可知，从 1918 年到 1931 年银行公会换届 8 次，其中设会长（主席）共 6 届，浙系先后由宋汉章、盛竹书、李馥荪出任 5 届会长，在已查明籍贯的董事或委员中，浙系所占的比重也在 43%—50% 之间。可见，银行公会这个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

① 徐寄庾：《最近上海金融史》，华丰印刷所 1926 年第 1 版，第 145 页。
② 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附录上海银行公会会员行表，1925 年版，此据台湾文海影印版。

织很大程度上已为浙籍银行掌握，成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组织形式。

三、随着金融实力的增强，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步入了 要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

1916 年中行沪分行经理宋汉章等联合以浙籍银行家为主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坚决而有效地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是浙籍金融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的典型事例。进入民国后，中国银行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财政工具之一，它与交通银行被迫为北京政府大量垫款并引起滥事发钞。到 1916 年两行向北京政府垫款达 6 000 万元，发钞达 8 300 万元^①，而准备金仅 2 300 万元，其中两行的上海分行占有半数^②。中、交两行现金库存枯竭的消息传出后，挤兑风潮从北京、天津等地的交行和广东、浙江中行开始向全国蔓延。北京政府于 1916 年 5 月 12 日发出全国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付现命令^③。“停兑令”发出后，两行天津、济南、重庆、成都、广州、张家口等分行先后遵令停兑，许多银行连带发生挤兑，给全国金融以巨大冲击。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接到“停兑令”后，即与副经理张嘉璈、胡棣荃和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景葵（董事长）、项兰生（书记长）、蒋抑卮（常务董事）紧急磋商应付方案^④，认为：如遵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且）中国银行与上海钱庄关系很深，若遵令停兑，上海数十家钱庄中不免有渐次破产者，其他有关系的小银行亦将如此”，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只能“寄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⑤，决定抗拒乱命，照常兑现付存。5 月 12 日，中行沪分行经受住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数千人的挤兑考验，随后挤兑人数逐渐减少，至 5 月挤兑风潮完全平息。

抗停兑胜利是江浙资产阶级联合抗争的结果，但唱主角的是浙籍银行家。宋汉章无疑是主帅，他以“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原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⑥的胆略和勇气毅然决定抗拒停兑，并为此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先就商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及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经理李馥荪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由蒋、李、陈以中行股东名义向会审公廨起诉分行经协理有损害股东权益行为^⑦；继则往访外资汇丰、德华两银行经理，约定向外国银行押借 200 万元（后因风潮不久平息并未动用）；又与原副经理、钱业领袖胡棣荃走访后马路各大钱庄，取得各钱庄必要时提供 100 万元予以支持的承诺^⑧。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作为中行上海分行的大股东和领券银行，与中

① 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1993 年版，第 70 页。

②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3 页。

③ 停兑令见《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 264—265 页。

④ 《旧上海的金融界》，第 15 页。“浙兴”与中行沪分行关系非常密切，这不仅因为宋汉章、胡棣荃、叶景葵、项兰生都出自大清银行，更重要的是“浙兴”是中行沪分行最大的领券银行，在中行沪分行的领券和存款有数百万，如中行停兑，势必损及“浙兴”。

⑤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 27 页；《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2—223 页。

⑥ 冯仲卿：《关于上海中行 1916 年抗令回忆》，《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49 辑，第 108 页。冯与宋汉章同籍浙江余姚，时任中行沪分行营业专员，1920 年升任襄理，次年升副行长。

⑦ 按租界法律：如诉讼成立，则在诉讼未判决前，北京政府就不能逮捕现任经、副理，宋等就可以主持抗停兑斗争。

⑧ 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及上海钱业，1914 年前后都与中行上海分行订立有领用中行钞票的契约，此后上海钱业“专用中行钞票矣”，（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华丰印刷所 1926 年，第 229 页），这是它们联合抗停兑的经济基础。

行沪分行取坚决一致态度,照常收兑中行兑换券,“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①,有力地支持了中行。以浙籍银行家、工商业者叶揆初、蒋抑卮、李馥荪、钱新之、项兰生、徐新六、徐寄庠、胡藻青、沈新三、周庆云、蒋孟萍等股东为核心的中行股东联合会,誓为中行上海分行经、副理后盾,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②。李馥荪首先以中行股东名义起诉中行上海分行,蒋抑卮“代谋复兴之策,切中窍要”^③,项兰生的家则成了宋汉章、张公权、胡棣荃、叶揆初、蒋抑卮等日夜密商对策之所^④,对斗争取胜都作出了贡献。胡棣荃利用他在钱业界的地位,与各钱庄经理约定照常接受中行沪分行兑券,并为中行广为收兑,其“匡赞之功亦不可没”^⑤。总之,抗停兑斗争把浙系金融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拒停兑既是浙江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之一,又是其发展的契机。在这一斗争中,宋汉章被誉为有胆识的爱国者,5月15日《新闻报》转载《字林西报》“社论”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该报“新评”也说“非资力雄厚兼有胆识者,何能若是!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勿躁矣”^⑥。的确如此,风潮平息后,中行上海分行的信誉空前提高,“实际成为商股经营的中国最大的银行”^⑦,奠定其作为上海银行家、工商实业家金融后盾的地位,宋汉章也成为上海金融领袖,长期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总行^⑧,1918年参与创办上海银行公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钱新之作为中行沪分行股东联合会秘书长在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1917年初交行上海分行复业后即出任协理^⑨,开始涉足银行业并由此崛起,1919年就升任经理。李馥荪因在抗停兑中首先以中行大股东身份延聘律师起诉中行沪分行,全力支持宋汉章,事后也身价倍增,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时当选书记董事,以后还长期担任银行公会主席。胡棣荃也在1918年复任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⑩。以上述银行家为代表的浙籍金融资产阶级在抗停兑斗争中深切感到:只有联合才能摆脱政府控制,获得独立自由发展,因而更加强相互间经济联系,逐渐形成以“南五行”为核心、银行资本与保险、钱业等资本融合的浙江金融财团。

四、涌现出一批本集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

在辛亥以后至20年代末的上海金融业大发展中,一批浙江籍金融人才迅速崛起。以钱业为主的诸如曾任6届钱业公会主席的钱业革新派代表秦润卿,中央信托公司创办人、曾任钱业公会总董的永丰庄经理田祈原,曾任钱业公会主席的同余庄经理邵燕山,曾任钱业公会主席的

① 项兰生在《菽叟年谱》中提到中行抗停兑时说:“宋汉章、张公权、胡棣荃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转见《中国银行行史》,第86页。盛慕杰在《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中说:“浙兴”集中资产向钱庄押款,秘密支持中行,见《旧上海的金融业》,第16页。

② 参见中国银行行史编委会:《中国银行行史》,第88、86、78—79页有关内容。

③ 叶揆初:《蒋抑卮家传》,藏上海市图书馆。

④ 项兰生:《菽叟年谱》,转见《中国银行行史》第86页。

⑤ 胡庆衍:《先考棣荃府君行述》,载《余姚胡棣荃先生哀挽录》,1920年铅印本,藏上海市图书馆。

⑥ 《新闻报》1916年5月16日,15日。

⑦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5页。

⑧ 详见前揭《中国银行行史》附录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附录三。

⑨ 1916年5月停兑令下达后,交行上海分行因实力不济,遵令停兑。12月,曹汝霖向日本为交行借款500万日元后,江浙一带分行首先复业。

⑩ 胡庆衍:《先考棣荃府君行述》,《余姚胡棣荃先生哀挽录》,1920年铅印本,上海市图书馆藏;前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三。

滋康庄经理何衷筱,曾任钱业公会副主席的安裕庄经理王鞠如、赓裕庄经理盛筱珊,曾任钱业公会副董的承裕庄经理的谢韬甫等。以银行业为主的诸如敢于抵抗北京政府“乱命”的宋汉章,被称为“洋进士”的吴鼎昌,被称为中国银行家中“四大名旦”之二的钱新之、李馥荪,以及盛竹书、蒋抑卮、叶景葵、徐寄庠、胡孟嘉、陈朵如、徐新六、孙衡甫、虞洽卿、严成德等。

这批金融人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绝大部分出生于沿杭州湾地区,特别是宁绍沿海地区。这里自古就是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钱庄业的发祥地之一。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不久,宁波就出现兼营银圆、铜钱兑换的南货店,并有统一的兑换率^①。清乾嘉年间,宁绍一带以经营借贷业务为主的“大同行”、“小同行”已十分发达,鸦片战争前后又开创了钱业界的“过帐制度”。所以这里有经营金融业的传统,宁绍人也以金融才能见长。从地理上看,这里面向辽阔的海洋,宁波、杭州等自唐宋后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鸦片战争后又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因而这里更多地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人们的商品意识、开放意识、金融意识远胜于其他地区。第二,以钱业为主的金融风云人物大多从小习业于钱庄,年富力强时担任了钱庄经理,具有丰富的钱业经营经验和卓越的经营才能。秦润卿14岁经表叔林韶斋(慈溪)介绍进苏州程氏协源庄当学徒,先后师从该庄经理沈荔泉(余姚)、罗樾卿(上虞)。他虽寒素布衣,然于业务兢兢业业,“行有余力,晨则习字,晚则学算,不稍怠忽”^②,成为“在商而有士行历”的儒商^③,由学徒迁帐房、信房、跑街,年刚过而立升任苏州程氏福源钱庄经理。从1917年起,他历任钱业公会副会长、会长、总董、主席及钱业联合准备库主席等职,成为公认的钱业领袖。邵燕山幼年就在上海市嘉惠钱庄习业,继至北市汇康钱庄服务,30初度时经南市商会会长王一亭引荐,出任甬商李云书创设的同余庄经理。他阅历丰富,“勤俭谨慎,不尚虚荣”,经理该庄30余年,虽历经风潮而一帆风顺,邵氏本人也因此成为上海钱业界的风云人物^④。素营钱业的李寿山,而立之年就出任苏州程氏顺康庄首任经理,也是一任30余年。他“对于现币颇有研究,阅历甚深”,且有胆识,经他操奇计盈,顺康庄在20多年里盈利达200多万元,使这家开办时仅为苏州顺康庄分庄的小钱庄一跃而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大型钱庄^⑤。俞佐廷早年上海恒祥庄习业,继而回家乡宁波任元一庄经理,在甬江“颇负盛名”。1931年回上海创办恒异庄并任经理。他经验丰富,被称为钱业中的“杰出人才”^⑥。王鞠如系南市震安庄习业出身,为该庄经理陈治卿(绍兴人)的高足,继在南北市涵春、元泰、永盛、承裕等多家钱庄服务,后任镇海方氏家族安裕庄经理,“于同业中颇露头角,终为业中翘楚”^⑦。被称为钱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的楼恂如(鄞县)也从钱庄习业出身,年不足而立,即出任敦余泰记庄经理,经他操奇计盈,这家开设时仅为元字号的小钱庄,很快成为颇具影响的汇划庄,他本人也连任多届钱业董事、执行委员^⑧。第三,银行界领袖人物大多受过较高层次的近代专门教育,不少留学国外,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具有近代民主意识和金融经营思想。蒋抑

① 茅普亭:《宁波钱庄小史》(油印本)。

② 秦润卿:《抹云楼家言》。

③ 唐文治:《慈溪秦润卿先生七十寿序》,《茹经堂文集》,六编,卷三。

④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调查课:《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油印本),第8号。

⑤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10号。

⑥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56号。

⑦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2号。

⑧ 《上海市钱业调查录》(1934年),第47号;及《上海钱庄史料》,第648—649页。

卮 1904 年留学日本,只因耳疾,“未克竟学”即于 1905 年回国,在日期间他“愤国势之陵夷,研究彼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勃兴,知金融与实业关系至密”,回国后即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①。吴鼎昌 22 岁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国后又获得商科进士,1912 年 28 岁时被任命为中国银行监督(首任行长),1917 年又发起创办了金城银行,同年又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 12 岁入上海南洋公学,18 岁毕业后赴英国留学,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士,接着又在法国巴黎国立政治大学专修国家财政学,年仅 27 岁担任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协理^②。胡孟嘉早年也就读于南洋公学,1908 年也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③,1921 年担任了交行沪行第一副经理。徐寄庠 16 岁就东渡日本,先入东京同文书院,继入山口高等商校专攻经济学,1910 年获得学士学位,从 1914 年任中国银行兰溪支行经理起,从事金融工作长达 40 年^④。钱新之 12 岁入上海育才学堂,17 岁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18 岁又官费留日,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习财政和银行学,回国后任教于南京商业学校,1917 年 32 岁时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⑤。宋汉章毕业于上海教会办的中西书院,曾服务于外人管理的海关,不久任通商银行华、洋两大班间的翻译,“对于欧美企业管理方法,耳习目染,不无体验”。进士出身的叶揆初“虽未留学国外,而在维新变法后,广览译著,富有欧美财政知识”^⑥。即便未受过正规近代教育的,在经营实践中也与外商频繁接触和亲密往来,虞洽卿就是其代表。他早年任鲁麟洋行买办,1902 年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从 1903 年起任荷兰银行买办达 30 余年,使他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增长了金融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第四,他们中不少是同乡、同学和多年同事,个人私交密切。如吴鼎昌与钱新之为吴兴同乡,又为密友,是“北四行”各联营机构的黄金搭档。胡孟嘉与徐新六是南洋公学的先后校友,且同为学界耆老唐文治入室弟子,1908 年两人又同时考取庚款赴欧留学生,并且同入伯明翰大学^⑦。徐寄庠与黄溯初是永嘉同乡,又是日本山口高等商校的同窗好友,回国后又在上海共同创办《时事新报》^⑧;而徐寄庠与李馥荪也是山口高等商校的校友^⑨。李馥荪与陈朵如既是绍兴同乡,在东京留学时又都攻读银行学(陈在早稻田大学),所以在日时就成为知交,1912 年两人同时受汤寿潜指派清理原浙江银行,从 1918 年起两人分任浙江实业银行总、协理,直至解放。叶揆初、吴鼎昌、宋汉章、项兰生又都是大清银行的同事,叶为总行监督,项任书记长,宋为上海分行经理,吴为南昌分行总办。而宋汉章与冯仲卿、胡桂芬、谢韬甫、孙铁卿、严成德、王怀廉、胡熙生都是余姚同乡,田祁原、何衷筱、裴云卿则是上虞同乡,他们都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头面人物。这种连锁同学、同乡、同事关系密切了彼此间的关系,成为浙江金融财团的纽带。

① 叶揆初:《蒋君抑卮家传》,藏上海市图书馆。

②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③ 胡若谷:《先父胡孟嘉事略》,《档案与历史》1997 年第 3 期。

④ 《金融领袖徐寄庠的生平》,《工商新闻周报》,第 12 期。

⑤ 徐矛等:《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8 页。

⑥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6 页,第 28 页。

⑦ 胡若谷:《先父胡孟嘉事略》,《档案与历史》1997 年第 3 期。

⑧ 朱镇华:《徐寄庠生平事迹》,《旧上海的金融界》,第 121 页。

⑨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第 74 页。